昆明学院学报　2012, 34(4):98~101　CN 53-1211/G4　ISSN 1674-5639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

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历史语境及对其批评的影响

田　丰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七一五"政变后,因种种原因,茅盾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转向文艺战线。1933 年《文学》创刊后,茅盾又把目光投向文学批评方面。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进行围剿,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在对作家作品评论时有较多顾忌,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寓政治思想于文学批评之中,同时他还要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压制,对不良创作倾向和文坛风气予以抨击,这都使得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具备了与此前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茅盾;文学批评;左翼文学;左翼刊物;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98-04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ts Influence to Mao Dun's Criticism in *Literature*

TIAN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After "715" Coup, Mao Dun turned his eyesight from the practical revolution to the art and literature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and then to literary criticism after *Literature* was founded in 1933. The outer surroundings for Mao's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ere severely bad and he could just combine his political thought with literary criticism instead of making comment freely for many works. Meanwhile, he had to hit back the suppression from the Kuomintang and harmful literary creation. All these ma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iticism in *Literatu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riticism before.

Key words: Mao Dun; literary criticism; left-wing Literature; left-wing publications; Literature

作为刊物的发起人和幕后的实际控制者,茅盾与 1933 年 7 月创刊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刊伊始,主编傅东华就把审阅全部外来投稿及撰写作品评论的工作交由茅盾来做,为此茅盾撰写了大量的期刊评论及作家作品评论,同时他也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深入反思和系统研究,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茅盾的文学批评与其作为主编或编辑的身份极其相关。无论是在上世纪 20 年代主编《小说月报》,还是 30 年代编辑《文学》及主编《文艺阵地》期间,他都需要撰写大量的文学批评以凸显刊物的风格,引领文坛风气,指导作家创作以及对本刊物内发表的作品进行评论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而在《文学》期间,较为特殊的是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在对作家作品评论时也较多顾忌,不能畅所欲言,往往用隐晦的笔法写出,寓政治思想于文学批评之中;同时他还要积极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压制,对不良的创作倾向和文坛风气坚决予以抨击。以上种种决定了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与其他时期批评的同体异质。本文对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背景进行说明,以期还原茅盾撰写批评时的历史语境。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任何人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约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超然存在。茅盾也不例外。他在《文学》上的批评也因受到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而显示出独特的面貌,对这一批评背景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

一、"矛盾"的选择——从革命家到文学家

茅盾作为一个"矛盾"的存在,在其一生中始终交织着从政或从文也即做革命家还是文学家的理想冲突。茅盾是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20 年末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成立后更是积极从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1923 年,在商务印书馆守旧派的排挤下,茅盾不得不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转到国文部去整理古籍。此后他逐渐把工作的重心由文学转向了政治,由文学批评家向职业革命家转变。"七一五"政变发生后,茅盾被迫转入地下,由武汉秘密地辗转牯岭后返回上海。亲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同时

收稿日期:2012-02-20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2011 年度)"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研究"(201101002)
作者简介:田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形形色色的动摇和叛变,茅盾一时间感到迷惘。他没有像其他共产党员那样紧紧跟上时代的脚步,而是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为了避祸,茅盾隐居在上海自己的家中,闭门不出长达十个月,此时的茅盾已经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向文艺战线。他失业在家,迫于生计,只好卖文为生,在隐居的十个月间,先后创作了三部中篇小说——《幻灭》、《动摇》和《追求》,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1928年7月茅盾东渡日本,直到1930年4月5日才回到上海。据他回忆,“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1]398。茅盾猜测党组织没有同他联系的原因是,“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1]39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茅盾并非像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那样面对生命危险即抛弃了自己的信仰,他从内心里仍渴望回归到党的群体之中。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除了回应太阳社、创造社成员对《追求》、《动摇》和《幻灭》的批评,他也对此前的经历作了简要的概述:“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二。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2]。这段话不啻于是茅盾对自己从文还是从政、做革命家还是做文学家内心矛盾的揭示,而这种矛盾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此消彼长,相互博弈。茅盾不论作为一个革命家还是文学家的存在,自日本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个人重新溶入到集体中去。当冯乃超代表左联邀请他加入时,他马上就同意了。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左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连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和郑振铎都被排斥在左联之外。党内左倾主义日趋严重,左联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越来越政党化,陷入了盲动主义,撒传单、搞演讲、举行飞行集会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做法又都是党决定的,因此茅盾并没有反对,只是对左联的工作采取了“自由主义”以示不满。1931年4月底瞿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时,茅盾向他提出恢复过组织生活,但因瞿秋白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瞿秋白转而劝茅盾像鲁迅那样安心从事创作。革命诉求的受挫,使茅盾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促使他转向了文学诉求。

茅盾虽于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两度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但都以写作或生病为由辞职,两次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年。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到了文学创作,进入了小说创作的丰产期。随着其都市题材长篇巨著《子夜》于1933年1月25日由开明书店发行,以及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林家铺子》(1932年7月15日《申报月刊》创刊号)、《春蚕》(1932年11月1日《现代》2卷1期)、《秋收》(1933年4月15日和5月15日《申报月刊》2卷第4、5期)和《残冬》(1933年7月1日《文学》创刊号)等一系列代表作相继问世,奠定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伟大小说家的地位。

《文学》创刊后,茅盾又把目光投向文学批评方面,延续了《小说月报》时的传统。但与《小说月报》时期身兼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不同的是,此时的茅盾转而具有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艺术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开辟自己的言说空间。左联内部的矛盾纠葛迫使他转而寻求与原来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合作。1933年春节前后,郑振铎从北平返沪后访问茅盾,谈到“现在缺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当年的《小说月报》;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1]598。郑振铎并非左联成员,此处所指的“自己”显然不是指左联。在茅盾和郑振铎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于1933年7月创刊。从刊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学》杂志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会在30年代的一种影响”[3]。经茅盾和郑振铎共同研究确定的编委会十位成员——鲁迅(对外界不公开)、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和徐调孚,除鲁迅、郁达夫、洪深外,其余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小说月报》前后四位主编全部囊括其中,而且《文学》的主编也一直由文学研究会成员担任。茅盾依靠文学研究会成员作为《文学》刊物的骨干力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文学阵地,也为《文学》抹上了一层“灰色”,使刊物能长期创办下去,这为茅盾重新评价和总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及1928年以来的革命文学运动提供了主要阵地。由于上世纪30年代仍然存在的派别之争和宗派意识显然影响到茅盾批评的选择范围,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文学批评方面,对于左联内部的文艺论争则较少涉入。在异常激烈的两个口号论争发生时,他还曾向主编傅东华建议《文学》不要涉入。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茅盾的文学批评也主要局限于对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批评和总结及对新进作家的引导和扶持方面。文学创作的亲身经历使茅盾体会到了作家创作的苦衷,更能自觉地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批评文学作品,侧重于从作家作品的角度条分细缕,少做理论上凌空蹈虚般的阐发。他在《文学》上展开的文学批评,相比于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其特点是结合文艺运动与创作实践从事理论建设与批评,较少作纯理论的探讨”[4]。黄源回顾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时也说过,“茅盾对革命文学运动的指导,不尚空谈,而根据作品,观察文艺的动向,指明方向,指点它的优缺点,加以指导的”[5]。

二、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文化情境

1930年经过“中原大战”,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

结束,国民党开始集中力量对付红军。为了配合对红色政权展开的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同时进行围剿。为了压制左翼文学,1930 年颁布实施了《新出图书呈缴规程》、《新闻法》和《出版法》等,规定书刊在创刊发行前必须接受审查登记,批准后方可出版。国民党当局还重点打击了与左翼联系紧密的出版机构。1930 年上海现代书局被查封,1931 年又查封了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许多进步刊物也被同期查封,以致于造成大量刊物的创刊号就是终刊号。到 1932 年底,左翼刊物在上海已经所剩无几。同时国民党还逮捕、绑架甚至暗杀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1931 年 2 月,左联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枪决。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收紧文网,致使左翼文学日益萎缩,文章发表数量急剧下降,左翼文学受到极大地打击。

1932 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轰炸,《小说月报》停刊,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文学导报》、《文学月报》、《北斗》等也先后被查禁,而"在一九三三年左联的文艺刊物,要公开地、长期地出版,已是不大可能了"[5]。左联自己办的刊物无法出版,也就意味着"左联的理论家和作家的作品,在当时没有阵地可以发表"[5],因而左联急需一个像《小说月报》那样居于文坛中心地位且能长期存在的大型文学刊物。面对国民党残酷的文化压制,左联在瞿秋白、鲁迅和茅盾等人的领导下,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由'左联'成员各自向中间地带开拓阵地,团结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共同开展革命文化工作,用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6]。茅盾寻求合作的中间力量正是原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和郑振铎都感到有必要立即创办一份新的大型文学杂志。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文学》编委会成员大多数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且历任主编全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但茅盾既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又是左联成员,鲁迅是公开的左联成员,胡愈之、陈望道都是支持左联的,这就使得《文学》处于左联和文学研究会两种合力的制约和平衡之中,因此带有一定的中间色彩。《文学》是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联合创办的刊物,虽然"不属'左联'领导,表面上它是个'商业性'的刊物,实际上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1]597。为了使刊物能长期办下去,茅盾认为自己是被戴上红帽子的,不适合出任主编,而此时郑振铎又远在北平任教,两人商议让傅东华担任主编。之所以选择傅东华,一方面傅东华曾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彼此十分熟悉,而且他暗地里倾向左翼,茅盾和郑振铎都抓得住他;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他属中间派,且原来有"轮盘赌"的习惯,其兄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由他出任主编可以为《文学》加上保护色。在郑振铎的动员下,傅东华答应下来。事实证明茅盾采取的这一编辑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虽然从一开始《文学》就显露出了明显的左倾倾向,发表了很多左联作家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文化特务的注意,但正如黄源所说,"国民党知道,傅东华和我,都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左联成员,对付《文学》不能像对付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和《文学月报》那样采取封闭及禁止发行的手段。因而《文学》能办下去,而且左翼作家们和五四以来的一些老作家、名作家,也就能在同一个刊物上并肩战斗,这不仅使读者的范围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也扩大了,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战线上的'围剿'终于一败涂地。"[5]

1933 年,国民党文化"围剿"日甚一日,11 月 12 日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13 日良友图书公司的大玻璃窗被砸……12 月上旬的一天,傅东华听到消息,《文学》月刊将被查禁,后改为从第 2 卷起,每期稿子都要经过审查员检查通过后方能付印,且必须署上主编人姓名。从第 2 卷起,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退入幕后。《文学》虽然得以继续出版,但国民党却利用审查办法滥施淫威,对第 2 卷第 1 号也即新年号的稿子大抽大砍,"保留下来的只有老舍的《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和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专号》"[1]629。这对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也产生了影响,最直接地表现就是期刊评论的增多和开始对翻译问题的研究探讨。期刊评论方面,此前只有《几种纯文艺的刊物》(1 卷 3 号)一篇,其后则大量出现,计有:《〈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2 卷 1 号)、《〈文学季刊〉创刊号》(2 卷 2 号)、《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3 卷 1 号)、《〈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3 卷 1 号)、《小市民文艺读物的歧路》(3 卷 2 号)、《两本新刊的文艺杂志》(3 卷 3 号)、《〈东流〉及其他》(3 卷 4 号)、《〈水星〉及其他》(3 卷 6 号)、《几本儿童杂志》(4 卷 3 号)、《奢侈的消闲的文艺刊物》(4 卷 3 号)、《杂志"潮"里的浪花》(4 卷 5 号)等。翻译评论方面,茅盾自 2 卷 3 号的《郭译〈战争与和平〉》起,先后有《又一篇账单》(2 卷 3 号)、《"媒婆"与"处女"》(2 卷 3 号)、《直译·顺译·歪译》(2 卷 3 号)、《翻译的直接与间接》(3 卷 2 号)、《关于〈士敏士〉》(3 卷 2 号)、《对于"翻译年"的希望》(4 卷 2 号)、《"翻译"和"批评"翻译》(4 卷 3 号)、《读〈小妇人〉——对于翻译方法的商榷》(5 卷 3 号)等九篇。

茅盾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曾指出:"对于那些没有版税收入的年轻的新进作家,辛辛苦苦写出一篇东西,却被检查老爷任意抽掉了,却意味着要勒紧几天裤带!既要革命,又要吃饭,逼得大家开动脑筋,对抗敌人的文化'围剿',于是有各种办法想了出来:化名写文章;纷纷出版新刊物(一九三四年故有'杂志年'之称);探讨学术问题;展开大众语、拉丁化问题的讨论;再就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译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创办起来

的”[1]644-645。从茅盾的这段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当时刊物创办下去的重要性和勉力维持的艰难处境。国民党文化压制的“‘特别国情’不许有新鲜的大鱼大肉供给他们(指读者),几家老厨房搬来搬去只是些腐鱼臭肉,几家新厨房偶然摆出点新鲜货来,就会弄得不能做生意”,再加上“好销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几个现钱,——虽然利息之薄,无可讳言”[7]。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压制,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急谋对策,因为国民党的乱抽乱砍使得他们忙于应付的同时,更急迫的是“多数作者是等着稿费买米下锅的,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需要想一万全之策,避开这三斧头,化被动为主动”[1]630。三人研究决定从 2 卷 3 号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避开国民党的文网,使刊物能接着办下去。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透过茅盾的回忆,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文艺论争的实质:大众语论战、文字拉丁化、翻译问题及其他学术问题的讨论等诚如茅盾所说主要是出于一种斗争策略的考虑,既可以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又可以借论争吸引众多读者的关注进而扩大发行量,使左翼作家既能“革命”,又能“吃饭”。茅盾撰写的这方面的批评大多言辞上不那么激烈,往往带着商榷的口气,以求“妥善地解决内部纠纷”,进而“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反动派作斗争”[8]。如在《小市民文艺读物的歧路》一文中,茅盾指出,《小说月刊》主编梁得所主张提供专给小市民吃的点心,只要有益卫生也无妨,在目今也是需要的,但他告诫无论如何不能端出消闲品,还应当适时地给小市民一些刺激,在点心中加一点辣椒。另如在《文学》1 卷 5 号上所作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乃针对赵家璧主编的良友版《木刻连环图画故事》系列画册而发,虽然指名道姓地对赵家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也对赵家璧欲借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进行“艺术大众化”尝试的用意表示赞成,相信“搬到中国来”的麦绥莱勒作品“也许可以给中国连环图画的将来一条有生命的路!”[9]赵家璧也认为“茅盾的文章指事不指人”,“看似一种论争,真正的用意是在对我进行一种善意的劝告”[10]26。直到茅盾逝世五年后,赵家璧还衷心感谢茅盾当年对他“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编辑一番支持培养的恩情”[10]24。但茅盾参与“文学遗产论战”、“小品文论战”所撰写的批评则显露出了锐利的锋芒,更具战斗性。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与反击国民党发动的“文言复兴运动”有关,茅盾和鲁迅并肩作战,给予迎头痛击。仅在第 3 卷中,茅盾就撰写了《再谈文学遗产》、《“文学遗产”与“洋八股”》、《对于“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所谓“历史问题”》、《不算浪费》和《一律恕不再奉陪》等六篇论文。茅盾参与“小品文论战”是对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专论苍蝇之微”[11]表示不满,抨击软性读物带有的“低级趣味”。在当时文化语境的催逼之下,文坛上产生了两种文学家:“一种是自命风雅的人,觉得政治是龌龊的,做生意是卑鄙的,……于是笑傲风月,寄感遣愁”;另一种“知道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管你;他们知道在万般商品化的社会里,文学也有商品化的危险,而且已在逐渐商品化了;……他们要做文艺家,正因为关心着政治的腐败,社会的混乱,以及文学商品化的危险”[12]。林语堂、周作人等幽默或小品文的倡导者都逐渐朝着茅盾所预测的方向发展,越来越远离现实斗争,相反倒是文坛上的新进青年作家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总而言之,无论是茅盾自身身份的转换还是当时的文化语境,都使得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具备了与此前不同的特征:少了一分铺张扬厉,多了一分沉稳坚实;少了一分横绝果敢,多了一分多谋善断。正是在这样的“矛盾”纠葛中才最终铸就了茅盾文学批评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茅盾. 从牯岭到东京[M]//茅盾全集:第十九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7.
[3]石曙萍. 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244.
[4]叶子铭. 茅盾六十余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点[G]//中国茅盾研究学会. 茅盾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44.
[5]黄源. 左联与《文学》[J]. 新文学史料,1980(1):59-63.
[6]赵家璧. 编辑忆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7.
[7]茅盾. 所谓“杂志年”[J]. 文学,1934,3(2):10-12.
[8]邵伯周. 茅盾评传[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237.
[9]茅盾. 木刻连环图画故事[J]. 文学,1933,1(5):8-10.
[10]赵家璧. 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茅盾. 关于小品文[J]. 文学,1934,3(1):16-19.
[12]茅盾. 文学家可为而不可为[J]. 文学,1933,1(1):3-6.